

全文检索

按标题

Go

登陆

用户名

密码

Go 注册=>

友情链接(不分先后)

所有文章>>学人博客

### 谁是“妇女”？---- 以及“妇女”作为话语的实践

作者：储卉娟 添加时间：2006-9-28

整理录入：star 本文浏览人次：132

资料来源：两性视野网

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毛泽东  
谁是妇女？

看上去有些怪异，但这个困惑确实源于日常生活：三八妇女节到底是谁的节日，校园里的女生属于“妇女”吗？从官方的界定来看，当然属于；但是从日常语言的理解来看，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接受这样的群体界定。对大多数人来说，“妇女”意味着已婚的、成年的、老态的、旧式的。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人，它其实是一个受女人鄙视被社会掷荒了的词语——仅适用于街道和农村里没有职业因此无从找到“性别—职业”代称的女人（李小江，1998）。

为什么会有这种语言符号运用上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认同尴尬？福柯不断提醒我们，词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符号，而且可以是“话语”——一组按照一定的顺序安排组织起来的符号，这种安排赋予这些符号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福柯，1999）。那么，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提问：“妇女”作为一个话语符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产生权力，这种权力如何进行生产性实践。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妇女”的使用和传播视为一个独立的“话语事件”（刘禾，2002），考察其所拥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政治力量（黄兴涛，2002），试图说明“妇女”，不同于与现代性话语紧密相联的“女性”，它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革命话语紧密相连的概念，发挥着革命动员的作用。在“妇女”与“女性”两种身份中痛苦游走，牵涉到中国女性群体如何选择生命体验的问题。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深刻的认识中国妇女所面临的政治困境：面临一个分裂的空间，双重的、同样沉重而虚假的性别角色。

#### 一、“妇女”：作为语言符号

作为一个固定的词，“妇女”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只有单音节的“妇”和“女”，而它们都是与家庭紧密相连的概念，与英文中强调群体性别特征的“Women”或者“female”大为不同。而事实上，在西方性别模式进入中国之前，汉语内也不存在任何有关女性群体的词汇。“妇女”作为指待女性群体的词汇出现是在晚清。1898年康有为发表《请禁妇女裹足折》，随后很多关于禁缠足兴女学的文献也使用“妇女”一词，但当时人们同时采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表征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总的来说，“妇女”一词出现的频率也并不高。

五四时期，一方面通过翻译以及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女性”作为单独的词汇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的视野，并成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另一方面，“妇女”却在另一个潮流——思想启蒙中被重新发现，并频频登场：五四运动前后出台的女性专刊纷纷以“妇女”为题，如《新妇女》、《妇女杂志》、《妇女画报》、《妇女评论》等。《妇女杂志》中《本杂志今后之方针》中更是直接将“妇女”与国民解放联系在一起，“我们觉得中国现在的妇女问题，不是少数一部分人的问题，是关乎全国民的大问题”。

如果说“女性”的使用和传播与“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时兴起有关，“妇女”真正成为一个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符号”则与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密切联系。1921年12月，由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份女性刊物被定名为《妇女声》，宣布“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而王会悟在《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趋向》中说到，“无产的妇女若不是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和奴隶制度开战，即是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时候，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1922年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

决议》，从此“妇女”在正式文件中成为指代全中国女性的必选词汇，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占据了政治上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就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 二、“妇女”：作为话语

那么，为什么会是“妇女”？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妇女”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形象和意识形态模式？这些形象怎样释放政治力量？在一系列以“妇女”为题的研究当中，Tani E. Barlow通过各种史料的梳理，敏锐地分辨出了共产党对于“妇女”一词的偏爱，并成功地指出了“妇女”所承载的革命动员意涵（Barlow, 1994）。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精彩的开头。至于这种关系何以建构，话语所蕴含的动员力量如何释放，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

1920年李汉俊、李达翻译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一次将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关于女性的部分以“妇女”指称，之后几乎所有马克思著作的翻译都遵循了这一原则。通过翻译，“妇女”与“无产阶级”、“劳工”、“劳动”等革命新名词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表征的是一个国际性的受压迫群体，以“劳动”为特征，与“无产阶级”处于同一阵营之内，并与资产阶级针锋相对。正如Barlow所着力论述的，在共产党这一时期的话语系统中，“妇女”基本等同于“女工”，“妇女解放”因此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通过“妇女”一词的反复使用，这种关联被不断复制，并传递着这样的信念：要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并不是烫头发进学堂爱情解放婚姻自由那么简单，而必须与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中国共产党进入农村之后，“妇女”的意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妇女”在马克思主义符号谱系中的位置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妇女”与中国传统话语的联系被重新挖掘出来。Barlow说得对，“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概念，它暗含着社会主义这个光明的未来（Barlow, 1994）。但她忽略了“妇女”同样是一个隐含过去的概念：它所包含的“妇”“女”与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因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妇女”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或者说，连接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的词汇。在被共产党采纳并不断使用的过程中，它是与中国女性千百年来作为“妇”与“女”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联系在一起的，也牵连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劳动）/再生产（生殖）等基本理论的形象，它既能包容过去的苦痛，也可以给这个群体以国际性的参照，并允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正是通过对“妇女”的使用和人们对“妇女”的接受，使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历史事实相结合在宣传实践上成为可能，有助于实现并完成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阶级动员。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一阶段的“妇女”还可以被分解为三种具体的形象。

“妇女”是劳动者。这个形象既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者，但也可以是中国传统勤劳能干的女性形象——“贤妻”的延续。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特别强调，“妇女”必须参加劳动：慰劳红军（做草鞋套鞋募集红军必须组织慰劳队），帮助红军（组织洗衣队，看护伤病兵）。这些任务与其说是创造生产力的生产，不如说是“贤妻贤妇”的职责；而1943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更明确强调：“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农村妇女能纺织、能养蚕、能种地、能煮饭、能喂猪、能理家……应该按照各地具体情形来作计划，但她们的生产计划，一定要和她们家庭的生产计划结合起来”。这样的劳动分工简直就是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分工模式的翻版，只不过用更广阔意义上的“国家”替代了“家庭”而已。

“妇女”是通过婚姻实现治理的媒介。通过各种《婚姻条例》和《婚姻法》，革命重新分配女人的身体，并完成对男人的革命动员。在这里，“妇女”话语内蕴含的传统意涵再次发挥了证成合法性的功能，毕竟“妇女”也是“女”，是待嫁的女人，而“在传统中，女人正是作为身体在场的，因为这个身体可以协助男人及其家族生育和生存”。虽然在各种婚姻法令当中，“妇女”是作为婚姻自由等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受益者而存在，但是当革命的婚姻法将妇女放在一个凸现的位置上，妇女却不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买卖婚姻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妇女仍然像以往一样被看作男权主义的附属物，是“女”，唯一的变化只是“价钱便宜了而已”。在每次革命论功行赏之日，女人的身体就会和土地一样被重新加以分配，总的流向是从富人家拖到穷人家（朱晓东，2001）。

“妇女”是革命的合作者。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提法，其实正意味着妇女并非革命的直接参与者，而只是继续充当中国传统的“背后的女人”。如果和提倡民族

大义等宣传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妇女”被鼓励扮演“岳母”的角色。正是通过她们在家庭内的行动，革命权力进入家庭，完成对最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组织及工作大纲》就曾提到，“广大劳动妇女必须有深刻的认识，而热烈起来宣传发动和鼓动他们的儿子丈夫及兄弟去当红军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若是这些劳动妇女不起来积极的参加各种工作，则工作的进行上要发生许多阻碍”；而在苏区广泛传唱的《十送红军》，更是将各种女性的情感——亲情和爱情与革命热情直接对立起来，通过“妇女”的自我压抑，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在情感与政治（落后与进步）之间游移，并最终选择了民族大义（进步）的“妇女”形象。

无论是劳动者，治理的媒介，还是革命的合作者，这些形象的确立与“妇女”本身所蕴含的话语力量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妇女”与社会主义的关联，使得这些形象本身具有了强烈的革命合法性；同时也是因为“妇女”与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让这些形象能够在乡村的传统生活实践中找到真实的依托，并且迅速转化为对形象背后行为模式的联想。当“妇女”本身所蕴含的双重意涵在广泛的使用和传播中得到不断复制的同时，社会主义与传统生活之间的钩联也在人们的想象中渐渐清晰，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般思想，塑造人们的行为预期和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妇女”这个问题上对本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强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农村地区的动员能力，并大大减少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进行思想和社会改造的成本和风险。

### 三、“妇女”：作为话语事件

无论是 Barlow 还是朱晓东，虽然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革命动员对“妇女”话语的利用，但同时也将“妇女”置入纯粹客体的位置，似乎话语本身仅仅作为一个政治动员工具存在。但是正如刘禾所强调，话语并不仅仅是等待诠释的符号，它本身就构成了德曼意义上的“事件”，因此在话语的“效果史”之外还要特别注意它自身所具有的制造合法化术语的力量（刘禾，2002）。那么，作为具有独立性和自主实践能力的话语事件，“妇女”的力量在何处呢？

从效果上来看，革命的确在使用“妇女”，利用它来动员妇女为革命和解放而奋斗献身。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日常的家庭劳动通过“妇女”的政治意义与整个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农村的女性们意识到虽然“不可能独身”，但是却可以自由选择从某一个穷人被“分配”到另一个穷人那里的时候，当她们开始自觉地压抑自己的情感送走家人，去实现一个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宏大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她们其实已经感受到了另一种身份的认同。这些农村的女性，正是因为接受了“话语”中所附着的意涵，不再认为自己仅仅是“妇”“女”或者“母”，而开始萌发某种群体的意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正是混杂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的“妇女”作为一种话语的使用和传播，在中国的某些农村地区完成了在城市里已经发生的性别认同，完成了精英意识向一般思想的传播与变迁。从此以后，中国女性，无论身处城市与乡村，才可能在意识上结成—个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在“妇女”的话语中，只是作为—种被剥离主观性别感受和性别需求的身体或者身份出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意味着中国女性的另—种认同方式，—种抛弃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认同，而寻求融入更广阔群体的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与革命话语的共谋（而不仅仅是革命话语本身），才使得妇女的解放从根基上被拖入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男性化政治语境里。认识到这一点，或许我们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福柯所谓“话语”的力量，—种同时关注权力技术和自我技术的分析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话语对行动者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就是被动的。如何展现话语事件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丁玲的写作，揭示同时作为知识女性和革命者的丁玲在“妇女”与“女性”之间挣扎的困境，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身为五四女性作家的代表者，丁玲早期的作品具有极其鲜明的“女性文学”的特点：开始采用西方的男/女二元模式思考，超越家庭挖掘自身作为—个独立于男性的群体存在的意义；与“妇”或“女”不同，“女性”存在的基础不再是与家的关联，而是自身情爱的欲望与冲动。她笔下著名的莎菲女士就不关心政治，并且除了“我”，她什么也不关心。丁玲的小说大多毫不涉及时代，仅仅让叙事者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讲述—个女人的体验，而日记体的写作也使得女性主体凸现出来，“她们在自己随心所欲、不合规范的存在状况中时常发现的是，在直面世界的同时，她们也必须遭遇自身”（梅贻慈，1990）。

但同时，由于生存心理、话语姿态上与社会现实的疏离，五四知识女性普遍遭遇的矛盾心理同样困扰着丁玲。跟娜拉—样，刚刚找到自主性的“莎菲”也需要方



向：“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通过回到问题小说的范畴，1928年以后的丁玲开始 致力于挖掘新生活的社会目的，但由于她无法放弃“女性”的视角，主角仍然是自我的“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的”“莎菲”，所以她的努力常常失败。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经说，她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堕落，要么回来。这个论断似乎也适用于丁玲的困境，但是丁玲没有堕落，也没有回来。她选择了放弃“女性”身份，进入另一个话语系统。

1931年夏，丁玲写了一篇题为《某夜》的短篇小说。没有“女性”，也没有情爱。小说写道，一群热血的青年，在临死之前交换着信任和爱的目光，唱着永远也没有机会唱完的《国际歌》。1936年10月，丁玲逃往延安。1937年末，她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团长，带领30多位艺术家和作家在山西和陕西一带为军队和当地农民演出，此期间她写作了一些表现抗日主题的剧本。这段时间，丁玲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女性”的立场，投入了完全不同的精神生活之中。从她的写作来看，一方面，“妇女”一词出现频率极高，另一方面，这些冠以“妇女”之名的角色也的确符合“妇女”所承载的革命形象：拒绝“女性”的自我意识，在革命集体中体验个体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或许可以从她1939年写的一篇故事中出现的两位革命妇女之间的简短对话中看出来：

[刘素说]“因为你是那么愉快，使人摸不清，薇底，一切生活的烦恼，似乎从没有影响到你似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养成这一种心情的？”

“你以为我都是这样的吗？我以前忧愁得很呢，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存在。我还能不快乐么？……”

但是，1940年以后丁玲的写作却开始出现变化。在1940年和1941年间写的一组四篇新小说中，丁玲突然开始深入探讨她在令人振奋的延安共产主义代表后面看到的苛刻、虚伪和幻灭问题。散文《不算情书》（1993）里，那个自称“德娃利斯”的女性所表达的井喷式的爱情，证明这位作家的女性意识是难以压抑的，至少也有失控的时候。到了40年代初，丁玲的女性意识在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冲出了自制的闸门，并表现为一种女权主义的愤懑：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里的贞贞被日寇掳去做随军妓女，却能在大不幸中多次为八路军送出情报。后来掏出魔掌回到村里，愚昧、冷漠的村民对她报以鄙视和厌弃。

更为关键的是，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尽管事先已经要求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丁玲却写道，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

丁玲终于在革命之外提出了“妇女”问题，“‘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她主张看到女人自己的“痛苦”和“血泪史”。这已经超出了“妇女”的范畴，实际上是在重提所谓的“女性”问题，并将矛头直指中共的领导阶层和意识形态，认为女性的苦痛无人理会，甚至在革命话语下被贬斥为“自作孽，活该”。

在“妇女同志”身份掩护下的丁玲提出了“女性”的宣言，结果是，两个月以后，据传毛取消了与丁玲等人合影的计划。4月，丁玲被撤销了编辑职务；5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要求延安的知识分子端正态度，面对党和读者。

6月11日，面对一系列的激烈反应，丁玲让步了。她承认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尽管她的文章是“血与泪的倾诉”，但她的态度代表的是一种延安落后的女权思想，在延安，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必须超越性别之间的差异。但是6月底，希望做回“女性”的丁玲还是被放逐，她奉命离开延安，到乡下去向农民“学习”。

1948年，丁玲写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部没有女主角没有爱情的小说，苦痛不再是女性所拥有的特殊经验，而只是附着于旧制度之上的国难家仇。程仁最终选择了人民的利益和不辜负党的期望，而关于他与黑妮的爱情，“他已不再为那些无形中捆绑着他的绳索而苦恼了，他也抖动双肩，轻松的回到了房里”。这部小说使得丁玲本人重新得到认可，并在党内获得比较显赫的地位，并成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于1948年底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妇女民主联盟大会。

从此之后，丁玲再一次放弃了对“女性”自我的探索，选择了“妇女”叙事，选择在“革命”紧密相连的话语系统中写作，这一时期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勤劳、谦逊、听从党的召唤，并准备把自己的全部能力都运用到动员农民抗战以及成为党的未来成员上面；或者说，“妇女”及其形象已经获得的力量逼迫她不得不成为“妇女”的一员，就像1944年丁玲从乡下返回延安，外国记者看到的照片上，丁玲在她居住窑洞外面的小片空地上种菜，并且自己动手纺棉纱，她看上去充满热情而且发自内心的愉快轻松。

但是，早在未完稿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二部》中，丁玲的莎菲女士就曾经说过：“不过我这人终究不行，旧的感情残留的太多了，你看我多么可笑，昨天竟跑了一下午，很想找一点牡丹花……”

#### 参考书目：

Tani E. Barlow: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u: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al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heoring Woman: Funu, Guojia and Jiating in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edited by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Wendy Larson: The end of “Funu Wenxue” :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 to 1935 in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edited by Tani. E. Barlow,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ristina K. Gilmartin: Gend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women’s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4-1927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al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msin E. Lorraine: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Westview Press, 1990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福柯集》，杜小真编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治理术》，赵晓力译，李猛校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1956年版

——《中国妇女运动百年大事记》，2003年版

臧健，董乃强编《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

王国敏编《20世纪的中国妇女》，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丁玲《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魑魅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张衍芸《春花秋叶 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载《胡风评论集》，下卷p19-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女人？》，载于邱仁宗编《中国妇女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版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新史学》，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猛《福柯》，载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黄兴涛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

朱晓东 通过婚姻的治理，未刊稿

这种尴尬是如此明显的存在，以至于很多高校里发展出了所谓的“女生节”，定在三月七日，来避免给女生们带来不快的感觉。

关于话语分析的主题，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第 2 章，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 年版。

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远离传统的语境中，所以这里已经不可能使用一个非常纯粹的本土概念。虽然每一种非本土的称谓背后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它特有的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但是考虑到语境和背景的特殊程度，本文还是选取“女性”作为“Women”的一般对应词，并展开论述。这种选取是经过考虑的，但当然这种选取也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价值倾向。

女性只有作为个体，或者是家庭某一成员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并不存在被作为一个相对于男性的群体被提及的可能性。例证可以参见陈宏谋的《教女遗规》中关于“妇”、“女”“贤妻”、“贤母”的界定，载于《四库提要》。

从杂志来看，从 1898 年的《女学报》开始，陆续出现了《女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等，基本采用“女”或“女界”，直到 1911 年才出现了以“妇女”为题的《妇女时报》，其它的称谓还包括“妇人”（如《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女子”（如《爱国女学校甲辰秋季补订章程》宗旨节：“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之心为宗旨”），“钗裙”（如《中国女学会致侯官薛女士绍徽书》：“恭敬合掌，为二万万裙钗礼谢”）……

见臧健，董乃强编《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提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 年版。

按照 Larson 的研究，“文学”本身也是一个外来词，当它从中国传统的“文”演变成与西方接轨的“文学”之时，它变成了传达西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或者说现代性主题的重要领域，但是尽管如此，“文”最根本的功能“载道”却被保留下来。注意到这一点，对于理解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或者“女性”可能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参见 Wendy Larson：《The end of “Funu Wenxue”：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 to 1935》，in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Tani E. Barlow, editor,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见《妇女声》1922 年 6 月 20 日，第 10 期。

与此相比较，1921 年的中共一大未明确涉及女性问题，而在 1921 年 11 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女子”和“妇女”仍然是掺杂使用的。二大之后的文件中，只有 1924 年 6 月 24 日的《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中综合使用了“女子”和“妇女”，但是前者指涉民国之前即所谓的传统女性，后者指追求革命和解放的现代女性，使用界限非常明显。参见《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而即便国共合作时期需要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女性运动作出区分，“三大”的《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仍只使用“妇女”一词，只是附加指出，不要轻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认为“在中国社会状况中，一般的妇女运动仍属本党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引用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虽然在今天使用“妇女”往往会造成日常生活中的尴尬，但是我们不能想象在有关政治的场合中以“女性”或者社会上更为流行的“女人”来全面取代“妇女”，比如“中华全国女人联合会”或者“女性解放”等等。

向警予在 20 年代的一系列评论中就曾经将“女性”归为资产阶级的范畴，指出要与这种女性形象决裂，投身真正的解放事业。转引自 Tani E. Barlow: Politics and protocols of Funu: (Un)making national Woman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al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Christina K. Gilmartin, Gail Hershatl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党的另一种自我技术“忆苦思甜”的逻辑非常类似，只不过后者采取了一种集体回忆的形式，而“妇女”则通过其话语力量实现了这种群体记忆的虚拟。关于忆苦思甜和相应的技术，可以参加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载《新史学》，杨念群、黄兴涛、毛丹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感谢朱晓东的《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提醒我注意“妇女”这一形象的存在，与传统的研究不同的是，他注意到了“妇女”作为“性”的主体与革命的关系。

一个例证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实施不久，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记道：“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

一般思想是葛兆光提出的概念，强调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对话语实践的分析可以离开纯粹文艺批评的维度，进入社会史分析的范畴。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导论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德曼是在讨论本雅明论翻译时使用“事件”这个词的：“当路德翻译圣经时，某些事发生了——在那一时刻，某些事发生了，并不是说从那以后发生了宗教战争，然后历史的进程被改变了，这些都不过是副产品。真正发生的是翻译。”在这里德曼强调的正是“话语”自身所具有的独立性和实践能力。见德曼：《对理性的抵抗》，P104，转引自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

即：谁使用 / 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又为了什么？强调的是文本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可以为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加以使用。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导论部分，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城市中的性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五四以后的流行文化实现的，“女性”一词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具体论述可见 Wendy Larson: The end of “Funu Wenxue”: Women’s literature from 1925 to 1935。

权力技术是指，这种技术决定了个人的行为，使他们受制于某种目的或支配。而自我技术是指，这种技术使个人借助自身或在他人的帮助下，针对他们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进行某些操作，从而改变自己，使自身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善或不朽的状态。见福柯：《治理术》，赵晓力译，李猛校。

主要脉络参考了张衍芸：《春花秋叶 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见丁玲文集第4卷 p111-112，转引自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至于原因，丁玲自己在80年代的回忆录《魍魉世界》中并没有提及。史景迁猜测是因为她看到了瞿秋白临死之前悲观的遗书之后，开始对革命和自我进行反思的结果。关于这一说法，见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4卷，p390-391

以上史实部分，引自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当前评论：

添加评论：[jm 5分](#) [jm 4分](#) [jm 3分](#) [jm 2分](#) [jm 1分](#)

发表评论

\*您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如有过激言论或不文明行为，网站管理人员有权取消您的帐号。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研究信息中心制作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站监制 备案编号：京ICP备06032579号

邮箱：webmaster@chinagender.org 电话：（010）84659067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版权所有 2003-2006